

F. R. 利维斯与文化研究

——从利维斯到霍加特 再到威廉斯

张瑞卿

摘要: 本文尝试厘清利维斯之文化批评经验与其身后文化研究(Cultural Studies)之历史发生学关系。文章将对利维斯的思想做一文化层面上的总体考察,同时将之下衍于 50 年代伊始的文化研究经历,对利维斯所代表的前文化研究与霍加特、威廉斯的文化研究之间在转承过程中经历的复杂性、矛盾性、斗争性方面做一探索性考证。本文以利维斯的文化诗学以及霍加特和威廉斯的早期文化文本《识字的用途》、《文化与社会》为研究对象,对三者文化观之学理联系做一分析,试图借之而获得对三者文化观之内在关系的一个较为完整的互文图解。研究证明:文化研究自诞生之日起,对大众文化的接纳,曾经历了从利维斯主义的否定到文化主义的矛盾肯定和批判肯定的复杂过程。

关键词: F. R. 利维斯; 霍加特; 威廉斯; 文化研究; 大众文化

作者简介: 张瑞卿,北京语言大学文学博士,温州大学城市学院英语副教授,主要从事文艺美学、文化理论研究。本文系 2013 年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课题“F. R. 利维斯与文化研究”[项目编号:13NDJC136YB]的阶段性成果。电子邮箱:carol-zh@163.com

Title: F. R. Leavis and Cultural Studies: From Leavis to Hoggart, and to Williams

Abstract: The present paper aims to clarify the genetic historical relationships between F. R. Leavis's cultural criticism and the discipline of Cultural Studies. It attempts a general survey of Leavis's criticism on culture, connecting him with the early development of Cultural Studies represented by Richard Hoggart and Raymond Williams in the 1950s, and examines the complexity, contradictions and struggles in the transition from Leavis to Hoggart and to Williams. Through an analysis of Leavis's cultural criticism, Hoggart's *Uses of Literacy* and Williams' *Culture and Society*, the paper delineates the internal relationships of intertextuality. The development of Cultural Studies has been a complicated process of absorbing mass culture and denying Leavisism, with contradictory and critical affirmation of culturalism.

Keywords: F. R. Leavis; Richard Hoggart; Raymond Williams; cultural studies; mass culture

Author: Zhang Ruiqing, Ph. D., is an associate professor of English at City College, Wenzhou University (Wenzhou 325035, China), with research interests mainly in literary studies and cultural studies. Email: carol-zh@163.com

回眸 20 世纪初西方文学批评史,英国文艺理论界一直存在以“文本中心论”为主导的两大学术分支:一是以 T. S. 艾略特(T. S. Eliot)和 I. A. 理查兹(I. A. Richards)等为代表的诗歌批评和语义分析研究。他们的批评思想为 20 世纪 30 年代兴起于美国,二战后发展至鼎盛的“新批评”(New Criticism)提供了理论和方法论资源。二是以利维斯为代表的“细察集团”(Scrutiny Group),^①他

们在英国境内的影响力远盛于同期的“新批评”。这一批评流派借鉴了理查兹实用批评的“细读法”(close reading),但秉承了马修·阿诺德(Matthew Arnold)文学批评关照的社会视角,侧重批评实践中的道德维度。这就是著名的“利维斯式的批评”(Leavisian Criticism)(Selden 26)。其批评实践在整个英国文化研究的系脉上起到了一种承上启下的作用,从而也成为探讨文化研究生

成史渊源所无法绕开的一个人物。对于二者之联系,国内外学者已有论述,但具体到利维斯所代表的前文化研究与霍加特、威廉斯的文化研究之间在转承中经历的复杂性、矛盾性、斗争性方面仍需做进一步探究。

一、利维斯的文化诗学

F. R. 利维斯(Frank Raymond Leavis)被誉为20世纪英国文学批评领域最具影响力的批评家之一。他一生著述丰厚,在近半个世纪的学术生涯中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批评成就:他是剑桥大学英文学院的创建者之一,^②他的批评理念在批评界独树一帜(Selden 23-26),他的《细察》集团“开启了英国文化研究之先河”(伊格尔顿 29)。

利维斯的文化批评起步于他1924年的博士论文《新闻业与文学之关系》,自此文学与社会遂成为他毕生上下求索、笔耕不辍的两大并行交叉的领域。从他著名的文化小册子《大众文明与少数人文化》(1930年)到其晚年的《思想、词语与创造性:劳伦斯的艺术与思想》(1976年),近三十部批评著作中,其论辩的核心始终是“文化与文明”的关系问题。其批评思想主要有三方面特征:第一,致力于诊断文学语言所折射的人类生活品质。利维斯认为:

处于我们文化中心的是语言,它承载着我们的精神传统、道德传统和情感传统。[……]假如语言在当代的使用趋于贬值(debased),而非促其焕发生机活力(invigorated),那么我们只有寄希望于文学,只有文学保持了语言最精微(subtlety)、最美妙的(finest)使用,与我们的精神传统相连,记录着“人类对过去的最佳体验”。(Leavis and Thompson 81-82)

这种语言的健康(health)和活力(vitality)是一个心智健全的文明社会之产物,而阅读文学则是在“与人类自身的存在之根恢复生命攸关的接触”(伊格尔顿 32)。为此,“真实性”、“具体性”、^③“健康性”、^④“成熟性”和“道德关怀”^⑤等术语遂成为利维斯及其《细察》集团探索人类经

验的评价标准,并构成利维斯文学研究所遵循的“活的原则”^⑥的核心话语。《伟大的传统》(1948年)所罗列的文学经典则提供了这种语言使用的最佳范本,进而成为评判和衡量那些肤浅的、非真实性语言使用的评价尺度。第二,利维斯式的批评话语语言说的是文化悲观主义的历史逻辑。利维斯曾三度著书盛赞劳伦斯小说。劳伦斯的作品能在利维斯心中引起共鸣,原因在于:一如劳伦斯,他也深爱着大自然,痛惜田园式古老英国的消失。利维斯写道“我们失去的是一个蕴藉着活生生文化的有机共同体(organic community)”(Leavis and Thompson 1)。他对消失的“有机共同体”的怀旧描写,折射出阿诺德对文化危机的焦虑性阐述。^⑦利维斯指出:17世纪工业革命之前,英国是一个“有机社会”,艺术家与受众分享着共同的感受性,因而记录着“人类对过去最佳体验的”伟大的文学传统得到传承和保护(82)。但是,工业革命之后,这种有机社会的秩序已被具有“进步特征”(Progress)(88)的现代工业文明毁掉了,以标准化、通俗性、娱乐性为特征的大众文化的盛行破坏了和谐的、个性化的“有机共同体”的生活方式。大众社会带给知识分子的可怕威胁是“感受性分离”^⑧和精神、道德危机。此乃利维斯提出的前景堪忧的文化衰落假说。第三,鉴于此,利维斯力主文化批评的道德维度,认为若要弥合“艺术”(文化)与“社会”之间的分裂,必须依赖“少数人”的创造性意识并通过教育的普及来扩大高雅文化的影响,以优秀的文学来教育、启迪、救赎大众(Leavis Education & University 143-45)。

在利维斯的著作中,文化被具体化为“文学”或者“文学经典”,成为治疗当代文明精神疾患的万应药方。这构成了利维斯式的“文化与文明”对峙的批判性话语。然而,其“大众救赎观”却招致广泛诤议,一生事业毁誉兼半。平心而论,虽然大众文化之于利维斯,乃是救赎和抵抗的对象,但是在英国思想界,他是严肃对待大众文化,将其纳入研究视野的第一位人文知识分子。这种尝试不仅拓宽了文学研究的版图,而且从相反的方向启迪了英国文化研究之后继者理查德·霍加特(Richard Hoggart)、雷蒙·威廉斯(Raymond Williams)。可以说,他们学术思想的成长与成熟,部分地建立在“对利维斯文化诗学思想的继承和修正的基础之上”(Inglis 47)。在此,二者的

亲缘关系毋容小觑。然而,当今学界仍存在对文化研究生成史认识上的误区,趋向于割裂利维斯的前文化研究与当代文化研究的历史互文性。有学者甚至提及文化研究,必视前者为文化精英思想批判之他者,而将后者颂为文化研究之“开山鼻祖”、“滥觞”、“先驱”等。

那么,“文化与文明”传统,在20世纪中叶英国社会“文化转型”的历史背景下产生过怎样的变化?利维斯式的批评与霍加特、威廉斯等所代表的文化研究有着怎样复杂的关系?传承在哪些方面?断层在哪里?修正在哪些方面?在当代文化研究的视野下,利维斯主义有着怎样的启示意义?要回答这些问题,我们不仅需要分别考察文化研究诞生的外在社会历史机缘,还需探讨20世纪中叶出现的几部重要的文化文本内在思想的发展理路,譬如霍加特的《识字用途》(*The Uses of Literacy*, 1957年)和威廉斯的《文化与社会》(*Culture and Society*, 1958年),并以它们为起点分别向他们后期的论著逐渐推演开去,以便清晰见出二者与利维斯渐行渐远的思想发展历程。将《识字用途》和《文化与社会》作为评述二人思想衍变的起点基于两方面的考虑:其一,无论从时间上还是思想上它们都是距离利维斯最近的,借助此时的写作更能真确地看清他们与利维斯的关联。其二,回到二者早期的批评文本有助于避开二者在后期著作和不同场合的公开声明,即坚持自己与利维斯式的批评保持着距离。这一点在其经典著作中会有更完整的呈现。

二、文化悲观主义阴影下的 《识字用途》

霍加特的《识字用途》(以下简称《识字》)于1957年面世,是继Q. D. 利维斯的《小说与阅读公众》(1932年)之后研究大众文化的又一部力作,被尊为文化研究的奠基性著作。书中,霍加特将自己亲身经历的30年代英国工人阶级文化与战后大众文化置于同一历史语境下考察,通过“新”“旧”秩序的对比,揭示出大众文化在工人阶级文化的发展过程中扮演的角色,以及大众文化带来的挑战与反思。《识字》即是对20世纪30至50年代英国社会转型期文化变迁的回应。

《识字》包含着一个松散的历史叙事,作者通

过对比描写新老两代工人阶级的生活方式,折射出利维斯式的历史逻辑:第一部分“旧的秩序”(An “Old” Order)揭示出30年代英格兰北部城市利兹(Leeds)的工人阶级所具备的道德素养,那种历经艰苦岁月磨练出来的“坚韧品格”(stoicism)(Hoggart *The Uses of Literacy* 78)。那是一个创造自己的娱乐和自我表现形式的世界,其文化是内因性的,而非屈从于外部商业传媒的压力。这也是当时多数中上层阶级成员知之甚少的世界。霍加特充满温情地描述了这个世界。第二部分原本是《识字》的主体部分,原名为《识字的误用》(*The Abuses of Literacy*)(Hoggart “Clowning” 144),为凸显自己熟悉的30年代工人阶级的生活和文化,霍加特加上了该书的第一部分。二战后,“美国化”大众文化的动态形式——好莱坞电影、流行音乐、商业广告、青年亚文化等开始入侵英国本土文化,肆意扩张的大众市场和大众消费主义不断侵蚀着工人阶级文化,打破了工人阶级原有的生活状态。它们以强劲的当代形式猛烈冲击着传统的“旧的秩序”。为此,第二部分取名为“让位给新时代”(Yielding Place to New)。面对这种文化趋势,霍加特忧心忡忡,痛惜这种文化形式中知识和道德因子的缺失:

多数大众娱乐形式终究是D. H. 劳伦斯所描述的“反生活的”(anti-life),充斥着颓废的俗丽、不良的诱惑和道德的缺失。[……]这类文化倾向于这样一种世界观,即进步被构想成对物质财富的追求,平等表现为道德的平庸,自由等同于无休止的、不负责任的享乐。(*The Uses of Literacy* 277)

霍加特以比照的方式说明,好的艺术(无论是精致艺术还是通俗艺术)在所有的细节上都能体现其道德内涵,鼓舞受众,“达到一种内在的智慧、感受力和辨识力”(*The Uses of Literacy* 277)。霍加特的这些主张明确表明他与人文主义文学传统之间错综复杂的内在联系。在其批评话语中,具有积极意义的术语都用来描述旧秩序,而含有贬抑的术语则用在了新秩序上。书中一个著名的策略是:坚持工人阶级受众绝不是大众媒体投射和倾倒入其出版物的容器,不能将工人阶级简单地看

作是“虚假意识”或者“文化毒品”的受害者,^⑨因为他们具有甄别和“抵抗能力”(resistance)(Hoggart *The Uses of Literacy* 268)。

然而,对于 50 年代青年工人阶级的文化现象,他并未真正避开对新的文化形式的悲观主义解读。该书第二部分中充斥着大量利维斯式的道德评价话语,并形成显著的两极对照:一面是奋斗、自制的生活目标;另一面则是被动的、缺乏自制的生活态度。艰苦生活对前者是一种激励,而繁荣富裕对后者是一种懈怠。这便为“新的出版物”的影响及其所预示的社会变化提供了一种思考模式。简言之,旧的美德让位于“温和的大众享乐主义”(Hoggart *The Uses of Literacy* 142)。霍加特嗟叹道:新的出版物远不及旧的出版物“有益于人们的身心健康”(wholesome)(*The Uses of Literacy* 183)。缘此,“道德评价”成为霍加特区分新旧秩序之好与坏,区分 30 年代工人阶级文化和 50 年代青年亚文化的批判性话语。他关注文化生活的质量问题,忧心大众社会带给工人阶级文化的不良影响,自始至终道德失望与文化悲观主义互为强化(*The Uses of Literacy* 260)。

从《识字》中,细心的读者会发现,在霍加特的笔下,大众文化并不具有进步意义,尽管他以利维斯式的反讽话语“进步”(Progress)称之,而这不过是一种物质和政治上的进步,绝非文化和精神上的进步(*The Uses of Literacy* 142-45)。因为他认为,大众读物为读者提供了他们潜意识中渴望得到的东西,这是一个没有现实生活的苦恼和道德律令限制的世界,有的只是对欲望的迎合,对现实的逃避。大众读物的肤浅直白和价格低廉加快了它们的流通速度,拥有越来越多的读者。其结果是生产了大批受大众文化潮流控制的、思想单一、缺乏判断力和批判能力的“单向度的人”。在此,我们不妨分别选取霍加特和利维斯式的话语做一分析比较,探讨二者之异同:

这类文学[……]是那些更普通的群体写出的最前卫的东西,只追求轰动效应而不承担责任的义务[……]终究不过是一种雌雄同体和自慰的文学。^⑩

总体来看,新的出版物的兴趣与其说是广泛猎奇,从狭义的角度,毋如说是

追求触目惊心的、与性丑闻相关的轰动效应。糟糕的是这种性趣味多停留在感官层面,一种疏离的替代品。(Hoggart *The Uses of Literacy* 183)

即使有一百个 D. H. 劳伦斯,他们都会以真诚的想法来反对这种无休止的、弥漫的、自慰的“科学”宣传的控制。商业化带给通俗艺术的又是怎样相似的货色?(Leavis *For Continuity* 105)

通俗报刊[……]几乎鼓励最肤浅、最直接的兴趣,最表面、最廉价的心理和情感反应,这一趋势正灾难性地显现出来。(Leavis and Thompson 102)

从以上四段不难看出,霍加特指责大众读物的腔调与利维斯式的批评话语如出一辙。论及通俗读物的品质特征,他们以相似的隐喻评论之,如“雌雄同体”、“自慰的文学”、“性丑闻”、“感官层面的性趣味”、“最直接和最肤浅的兴趣”等,以凸显大众读物的低俗性。这些与低级的性趣味相关的批评话语无疑隐射大众读物的粗制滥造、低级趣味,目的在于迎合受众,诱使其沉湎于浅薄愚昧的享乐主义幻觉。论及通俗读物的流行趋势,他们用相近的修饰语形容之,如“最前卫的”、“追求轰动效应的”、“触目惊心的”、“弥漫的”、“灾难性的”等,此类话语显然指涉大众文化之来势凶猛、势不可挡,同时也折射出这些文化保守主义者对新的文化现象的失望和无奈之情。文中霍加特同样以利维斯式的话语逻辑分析了通俗报刊及其他商业化的文化形式受到责难的原因:

并非因为[它们]未能达到经典化的程度,而是[它们]未能真正显示出具体性和个体性。生活的品质、那种生动的回应、那种扎根于智慧和成熟性的深厚底蕴,这是所有通俗艺术和非经典艺术应该具备的品质。唯有如此,它们才能像经典艺术那样具有价值。但是,“新的”出版物并不具备这些品质,也不大可能使受众达到一种内在的智慧和以人民的意识和态度体验和感觉到的辨析

力。毁掉旧的根基容易,但是以相当品质的东西替代之却不容易。(Hoggart *The Uses of Literacy* 277)

在此,霍加特并未跳出利维斯式的话语模式,未能摆脱传统的高等/低等、好的/坏的大众文化论争范畴。在霍加特看来,“具体性”、“个体性”、“成熟性”和“感觉到的辨识力”这些文学批评的基本价值观似乎被永久地拴在了“旧的根基”上。按照这样的话语逻辑:变化带来的只能是“今不如昔”(a worsening)(*The Uses of Literacy* 260)。不难看出,从审美角度寻求大众文化的合法性,使他陷入了文化悲观主义的评价。

《识字》集中体现出霍加特文化观的矛盾性和复杂性。这种矛盾性在对30年代的“旧秩序”和50年代的“新秩序”的对照描写中浮现出来。《识字的用途》原名为《识字的误用》,似乎原来的书名更准确地转达出了霍加特的文化观。在第一部分中,霍加特从工人阶级的日常生活、生活态度和文化模式入手,生动而客观地描摹了30年代工人阶级的文化,肯定了工人阶级文化所蕴含的积极性、有机性和丰富性因素。在这一意义上,霍加特实现了对利维斯式精英文化观的超越。然而,在第二部分中,在比照分析“过去的文化”与“当今的文化”的关系时,霍加特又回到了精英主义立场,认为大众文化与经典文化相比缺乏必要的“具体性”、“成熟性”、“健康性”等品格,实质上是一种商业骗局。换句话说,霍加特一方面强调大众文化在当代文化研究中的中心位置,而另一方面则以传统的道德判断和审美标准来评判大众文化,“旧的文化”实质上成为抵抗“新的文化”的批判性话语,从而于无意识中落入文化衰落的悲观主义和怀旧情绪之中,并陷入利维斯式的话语逻辑。利维斯等人所怀念的是17世纪末未被工业文明污染的“有机社会”,而霍加特难以忘怀的则是20世纪30年代的工人阶级文化。也就是说,霍加特追缅的“有机文化”正是利维斯主义者批判的工业社会的文化,在此霍加特对工人阶级文化的肯定正是对利维斯主义的批判,不同于利维斯将工人阶级文化混同于大众文化的完全否定,他对新一代工人阶级文化怀有一种矛盾肯定的态度。他虽然摆脱了简单化的精英与大众、有机与无机的二元论,却落入了新与旧、好与坏的新

的二元轮回。为此,他使得自己成为新一轮文化研究学者所批判的文化保守主义者。因此,有人称霍加特为“左派利维斯主义者”也就不难理解了。那么,如何走出霍加特思想上的矛盾徘徊,促使边缘文化真正为文化研究所接纳,有待于新的思想突破。

三、威廉斯的修正:从共同文化到感觉结构

在英国文化研究的谱系中,真正完成对“文化与文明”传统的反驳和文化政治诠释转向的是雷蒙·威廉斯。在与利维斯主义的对话中,威廉斯的文化思想也经历了一个渐进成熟的过程。早在《文化是平常的》(1957年)一文中,威廉斯言及其思想曾受到来自两种学说的塑型:一是马克思主义,二是利维斯的教导(“Culture is Ordinary” 8)。这两方面的影响经由威廉斯创造性地发展和完善,成就了他身后留给后世的重要思想遗产。第一,推导出马克思主义文化唯物论,第二,重新阐释了利维斯坚守的文化传统。这两方面的思想探索为文化研究的新范式奠定了理论基础。那么,威廉斯是如何完成这一创造性工作的呢?

威廉斯曾坦言,利维斯的“文化激进主义”(Politics and Letters 66)是其文化理论的起点。他尝试借鉴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文化立场”来改造和融合利维斯主义,实现“文化与社会”传统对“文化与文明”传统的反拨——甚至颠覆。在其早期文化著作《文化与社会》(1958年)和《长久的革命》(1961年)中,威廉斯对文化概念的新阐释,即文化是“整体生活方式”,将“文化”从“少数人文化”的精英主义话语中解放出来,使其与“大众文化”一道成为“整体生活方式”的组成部分,尤其是尊重工人阶级的文化成果。这即为后期文化研究的“大众化路线”开辟了道路。其次,为寻求更坚实的理论支撑,威廉斯创造性地拓展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这个基本命题。通过扩大“基础”这一端,探讨文化的物质性和生产性,把“文化”从“上层建筑”的束缚中拯救出来。这构成其“文化唯物论”的基础(Williams *Marxism and Literature* 75-100)。基于这两方面的探索,他为大众文化正了名:它们也承载着社会意义和社会价值,参与了“共同文化”的

建设,同时反映出一个时期,一个群体的“感觉结构”(*Culture and Society* 99-119)。自此,文学艺术所代表的精致文化由中心滑向边缘,成为文化研究的文本之一。换言之,前英国文化观念史中“文化与文明”的对立到了威廉斯时代,已演变为“文化与社会”的平等关系,并共同构成一枚文化硬币的两面。

那么,如何理解威廉斯文化唯物论中的两个重要概念“共同文化”和“感觉结构”呢?它们与利维斯主义有着怎样复杂的关系?要回答这两个问题,我们还需回到威廉斯的文化经典著作。在《文化与社会》中,威廉斯以“工业”、“民主”、“阶级”、“艺术”、“文化”五个关键词为主线,梳理了近两百年里(1780年—1950年)活跃于英国思想界的四十位作家和思想家,完成了对“文化与社会”传统的多维呈现。其中,利维斯主义是对他影响最大,也是他必须面对的思想体系。威廉斯说“我十分清楚我写作的目的就是要反驳艾略特和利维斯等文化保守主义者——他们已经使英国文学和文化空洞苍白”(*Politics and Letters* 112)。利维斯的批评传统无疑为他提供了认识论和方法论基础,但是他拒绝其残存的社会等级观念(Johnson 152),反对利维斯把理想的社会建筑在对过去的“有机社会”的追念,将“混乱、无序”的现在与“有序、快乐”的过去对立起来的做法(154)。与之相对,威廉斯提出建立“共同文化”(common culture)的设想。

威廉斯是在《从易卜生到艾略特的戏剧》(1952年)一书中提出“共同文化”概念的。在《文化与社会》的“结论”中,威廉斯重提“共同文化”,并赋予它以新的内涵。他坚信这样的理想:共同文化将有助于消除社会差别和不平等现象(*Culture and Society* 318-22)。其“文化平等观”可以追溯到20世纪初英国社会批评家和道德学家R. H. 托尼(R. H. Tawney)。他在《平等》(*Equality*, 1931年)一书中,批判了当时英国社会存在的不平等现象和森严的等级制度,提出在平等基础上建立“共同文化”的思路。这一想法在威廉斯的思想中产生了强烈共鸣:如果没有一种“共同文化”,缺乏一种“真正的共同经验”,我们的社会将不会长久存在(304)。威廉斯这样定义共同文化:

我们[……]旨在创造这样一种社会,其价值观是共同创造的,在此对阶级的讨论和否决要由普通的、平等的全体成员来决定。这就是共同文化的理念。(“Culture and Revolution” 308)

威廉斯认为一种平等主义的社会(an egalitarian society)是共同文化的基础。然而,他并未奢望人类在所有方面都是平等的。他唯一期待的平等是“生存平等”(equality of being)(*Culture and Society* 304-05),因为生存平等的反面——生存的不平等——实际上是对他人的否定和人格的剥蚀(304)。因此,威廉斯心仪的“共同文化”不再是利维斯对“有机社会”的怀旧。二者的关键区别在于:威廉斯主张的共同文化不是由少数“文化精英”或者“局外人”选择、过滤后输送给大众,由大众被动接受和体验的“经典文化”,而是由社会全体成员平等参与、共同创造、共同分享的“共同文化”。威廉斯所指的“所有的社会成员”既包括知识精英,也包括大众百姓、工人阶级等边缘群体。

威廉斯对“共同文化”的向往同样源自他工人阶级的家庭背景。这种与生俱来的阶级情感使他始终将学术关注的目光投向受大众文化冲击的“工人阶级文化”。他十分赞赏支撑工人阶级文化的团结意识和集体主义观念,坚信工人阶级是参与民主进程、塑造共同文化的重要力量。但是,他反对将“工人阶级=大众(masses)”、“大众=暴民(mob)”混为一谈的做法(296)。原因是:从词源学和语义学的角度,“大众”一词接近“暴民”一词的用法。由于“大众”一词这一贬抑用法,“大众文化”多被知识精英归为劣质文化。缘此,威廉斯在其学术生涯中一直沿用“通俗文化”(popular culture)来替代“大众文化”,以表示对精英主义文化观的不满。不难看出,威廉斯与同是工人阶级出身的霍加特一样,都反对将工人阶级文化等同于大众文化,而将工人阶级文化扩大到广阔的日常生活范畴。然而,在为“工人阶级文化”辩护时,威廉斯又极力以孰优孰劣的二元对立来差别看待工人阶级文化和大众文化,在肯定“大众”和“大众文化”的意义和价值的同时,不自觉地将其排斥在“共同文化”建设这一“充分民主的过程”(318)之外,于无意识中表现出新的文化

保守主义倾向。故而,在寻求与利维斯主义的根本性突破的道路上,仍需进一步的理论创新。

威廉斯文化唯物论的另一个重要概念是“感觉结构”(structure of feeling),又译“情感结构”。“感觉结构”这一概念最初见于《电影导论》(1954年)中,用以描述特定时期人们对现实生活的普遍感受。在《文化与社会》和《长久的革命》中,威廉斯对这一概念进行了补充和完善,进一步区分出感觉结构的三层次:特定时期特定地域活生生的文化(the lived culture);记录下来的文化(the recorded culture);选择传统的文化(selective tradition)(Williams *The Long Revolution* 49)。其中最重要的是活生生的文化,它既是感觉结构的直接来源,也是记录文化和选择传统文化的基础。而选择传统文化显然等同于“文献文化”,这就不难理解威廉斯文化概念中所饱含的民主意识。保罗·琼斯(Paul Jones)认为,他不是为了“低级文化”而拒绝“高级文化”,也不是为了“生活方式的文化”而排斥“高等文化”,而是相对于第一层次活生生的文化而言,承认所有被“客观化的文化”都是“文献”(Jones 21-22)。如此一来,文化生活的“主体”便不是利维斯等人所偏重的“少数人”,而是所谓的“大众”,特别是工人阶级,而文化研究的主要对象则是体现着当代意义的“活生生”的大众文化、工人阶级文化、青年亚文化乃至“整体生活方式”。这亦为解释新的文化现象提供了理论依据。威廉斯指出:

一代人训练自己的后继者,在社会特征或一般文化模式方面能取得尚好的成功,但是新一代却会形成他们自己的感觉结构,其感觉结构似乎并非“来自于”什么地方。极为特别的是:新一代人会以自己的方式对他们继承的独特世界做出反应,吸收许多可回溯的连续性,再生产出可被单独描述的新内容,然而却以不同的方式感受着他们全部的生活,将他们的创造性反应塑造成一种新的感觉结构。(The *Long Revolution* 48-49)

在此,威廉斯并未直接用“大众文化”或者“青年亚文化”来指涉“新的感觉结构”,但是这段

话可作为理解威廉斯利用感觉结构模式来分析“活生生的”新的文化现象的极好注解。他以比照的方式,突出感觉结构的独特方面:其一,感觉结构不受“习得形式”的限制,有着“更深入、更广泛的影响”(The *Long Revolution* 48),其形成的渠道是多方面的,诸如家庭传承、教育影响、社会交往、志趣爱好、娱乐形式、传播媒介等,有着更强的无意识性和自觉意识。而社会特征的影响力则稍显逊色,因其传播的价值观多为传统、正统的主流意识形态观念,并主要通过较为正规的学校教育 and 家庭影响来实现(The *Long Revolution* 61-63)。而青年人的特点是喜欢新奇、向往自由、追求个性,反对被旧的传统思想所束缚,因此容易与社会特征所强调的价值观形成抵触和对立。其次,威廉斯发掘出新的文化形式的进步性、时代性和独特性特征,譬如青年人以“自己的方式”面对他们所继承的世界,他们的文化不仅汲取了传统因子,而且融合了现代成分。他们以与父辈不同的方式感受着他们的生活,创造性地塑造出一种“新的感觉结构”。在此,我们看到的是一种与霍加特的青年亚文化批评、利维斯的大众文化批判全然不同的文化分析模式。其差别不仅体现在思想认识上,以新的视角看待新的文化现象,揭示出威廉斯的文化唯物主义思想,而且在方法论上,其分析推理展示出更为开阔的民主平等意识,从而摆脱了道德评价非此即彼的二元对立。在此,威廉斯坚定地迈出了霍加特的矛盾徘徊,突破了利维斯主义的历史逻辑。

由此可见,英国文化研究在其发展过程中,在实现从利维斯主义到文化主义的转型中,对大众文化的接纳经历了由利维斯的否定到霍加特的矛盾肯定,再到威廉斯的批判肯定三阶段。这种变化揭示出文化研究对大众文化的渐进认识过程,生动记录了三位思想家承前启后,在英国社会“文化转型期”面对新的文化现象的挑战,积极探索理解文化新思路的艰辛历程。

结 语

如今,文化研究经几代学者的薪火相传,在国际学界已成显学。利维斯作为老一代批评家已淡出人们的视线,但是他似乎是一位不会被人们遗忘的人物。他的文学观、文化观无论在其生前还

是生后都曾引发巨大的反响和争议。事实上,能够引发争鸣本身就是一种可贵的思想贡献和学术资源,这也恰恰说明这一传统根深蒂固、无处不在的影响力。特里·伊格尔顿曾感叹道:

无论《细察》(Scrutiny)是“成功”还是“失败”[……]事实仍然是今天(1983)在英国研习文学的学者们都是“利维斯主义者”,不管他们自己是否意识到这一点,这是那段特定的历史所无法改变的。(27)

利维斯的文化批评不仅是文化研究话语逻辑推进的重要一环,而且对于文化研究的发展蕴含着原创性思想的种子。威廉斯坦承利维斯主义是其理论的起点。在追忆当年创办《政治与文学》(1947年—1948年)这份杂志时,他说“利维斯的文化激进主义有着无穷的魅力。[……]最先吸引我们的是利维斯对学院派、布卢姆斯伯里、都市文学文化、商业出版物以及广告的抨击。其次,在文学研究中发现了实用批评,这种批评简直令人陶醉,那种感觉真是妙不可言”(Politics and Letters 66)。霍加特也并不讳言自己与利维斯主义的继承关系。1990年,在接受采访时,他谈道:“当前,把利维斯视为‘精英主义者’而加以排斥已成时尚,这实际上忽略了存在着每一种不同智慧的可能性”(Corner 278)。霍加特指出:文化的定义包含着两面:一面是《识字》的前半部分中给出的人类学意义上的定义,一面是阿诺德的文化定义,即“所思所想最好的那部分”。在这一方面,“我是一个阿诺德主义者”(278)。因此,无论威廉斯还是霍加特,他们都是利维斯文化诗学的践行者。正是由于利维斯式批评的开创之功,才有当代文化研究在20世纪中叶在英国学界的迅速崛起。这也从另一侧面证实了伊格尔顿的断言:利维斯《细察》集团实际上开启了英国文化研究之先河。

注释[Notes]

① 细察集团(Scrutiny Group)源自利维斯夫妇于1932年创办的《细察》季刊(Scrutiny, 1932-1953),投稿人多为利维斯夫妇的学生团队。该刊以优质、敏锐、智性的批评智慧著称。创刊二十一年中,曾吸引了众多英国著名学者,他

们既是《细察》的热心读者,也是积极撰稿人,比如T. S. 艾略特、乔治·桑塔亚纳、R. H. 托尼、奥尔多斯·赫胥黎、雷纳·韦勒克等。

② See MacKillop, Ian. F. R. Leavis: A Life of Criticism. London: The Penguin Press, 1995. 53-77. 持相同观点的理论家还有Fred Inglis, D. J. Palmer和Terry Eagleton. 参见Inglis, Fred. Cultural Studies. Oxford & Cambridge: Blackwell, 1993. 33-37; see also Palmer, D. J.. The Rise of English Studies.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5. 97-100; see also Eagleton, Terry. Literary Theory: An Introduction. Beijing: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 Research Press, 2004. 22-28.

③ “具体性”(concreteness)是利维斯文学批评重要的评价标准之一。他曾在《走向批评标准》中对这一术语做了限定性说明,后在《重新评价》中,在分析比较莎翁和雪莱语言之优劣时做了详细阐释。See Leavis, F. R.. Towards the Standards of Criticism. London: Wishart, 1933. 9; see also Leavis, F. R.. Revaluation: Tradition & Development in English Poetry. London: Chatto & Wintus, 1936. 187-188, 196.

④ “健康性”(healthiness)作为利维斯另一批评术语,初见於他1930年面世的小册子《大众文明与少数人文化》,文中引用I. A. 理查兹在《文学批评原理》中的一段话“批评家[……]对于心灵健康的关注一如医生对于身体健康的关注”(The critic [...] is as much concerned with the health of the mind as any doctor with the health of the body.) ,借以强调“健康性”标准在文学批评中的重要性。See Leavis, F. R.. “Mass Civilization and Minority Culture”. Education & University. London: Chatto & Wintus, 1943. 144; see also Richards, I. A.. The Principles of Literary Criticism. London: Kegan Paul, Trench, Trubner, 1924. 61; see also Leavis, F. R. & Denys Thompson. Culture and Environment. London: Chatto & Wintus, 1933. 94-95.

⑤ “成熟性”和“道德关怀”(maturity & moral concern)作为利维斯小说批评的重要术语,是其评价英国19世纪至20世纪经典小说的评价标准。See Leavis, F. R.. The Great Tradition. New York: NY University Press, 1960. 49-67, 93-109, 8-29; see also Leavis, F. R.. Determination. London: Haskell House Publishers LTD, 1970. 2.

⑥ “活的原则”(living principle)是利维斯文学批评所遵循的核心原则,即一种对诗歌及文学语言“全身心的回应、感受和领悟”,其优势在于进入一个文本的“具体完满性”之中。1933年,在《走向批评标准》的绪论中,利维斯借助对《现代文学纪事》(The Calendar of Modern Letters, 1925-1927)的评价,明确提出“活的原则”的批评思想。1937年,在与雷纳·韦勒克交换意见的著名文章《文学批

评与哲学》中,基于学科差异的论证,利维斯坚守文学批评“活的原则”的合法性。1975年,在其后期的批评著作《活的原则》中,他深入、系统地阐述了“活的原则”的美学思想。See Leavis, F. R.. *The Common Pursuit*. London: Chatto & Windus, January. 1952. 213; see also Leavis, F. R.. *Towards the Standards of Criticism*, 1933. 6-9; see also Leavis, F. R.. “Literary Criticism and Philosophy”. *Scrutiny*. Vol. V. No. 4. March, 1937, 及其 *The Living Principle*. London: Chatto & Windus, 1975. 71-150, 212.

⑦ 从利维斯的小册子《大众文明与少数人文化》开篇直接引用阿诺德的语录,就不难看出利维斯与阿诺德文化思想的亲缘关系。原文如下:“And this function is particularly important in our modern world, of which the whole civilization is, to a much greater degree than the civilization of Greece and Rome, mechanical and external, and tends constantly to become so.” —*Culture and Anarchy*, 1869. See Leavis, F. R.. *Education & the University*. London: Chatto & Wintus, 1943. 143.

⑧ “感受性分离”(disassociation of sensibility)这一术语是利维斯借自T. S. 艾略特在《玄学派诗人》一文中提出的“感受性分离”的问题。艾略特讲到“在17世纪,某种感受性分离的现象开始出现,从此未得以恢复,伴随17世纪两位最重要的诗人——弥尔顿和德莱顿——的影响,这种感受性分离的状况日益严重。”See Eliot, T. S.. “The Metaphysical Poets.” *Selected Essays*. London: Faber & Faber Limited, 1932. 1941. 288. 利维斯在其批评著作《论延续性》和《〈安娜·卡列妮娜〉及其他文章》中对该术语又做了深入阐述。See Leavis, F. R.. *For Continuity*. Cambridge: Minority Press, 50-56; see also Leavis, F. R.. “*Anna Karenina*” and *Other Essays*. London: Chatto & Windus. January, 1967. 163.

⑨ See Hall, Stuart. “De-constructing the Popular”. Raphael Samuel, ed. *People's History and Socialist Theory*. London: Routledge & Kegan Paul, 1981.

⑩ 这段话来自霍加特的《识字的误用》(*Abuses of Literacy*)的原稿。See Owen, Sue. “*The Abuses of Literacy* and the Feeling Heart: the Trials of Richard Hoggart”. *The Cambridge Quarterly*, 2005. 174-75.

引用作品[Works Cited]

Corner, John. “Studying Culture-Reflections and Assessments: An Interview with Richard Hoggart.” *Uses of Literacy*. New Brunswick: Transaction Publishers, 1998.
特里·伊格尔顿《二十世纪西方文学理论》,伍晓明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
[Eagleton, Terry. *Literary Theory: An Introduction*. Trans. Wu Xiaoming. Beijing: Peking University Publishing

House, 2007.]

Eliot, T. S.. “The Metaphysical Poets.” *Selected Essays*. London: Faber & Faber. 1941.

Hall, Stuart. “De-constructing the Popular.” *People's History and Socialist Theory*. Ed. Raphael Samuel. London: Routledge & Kegan Paul, 1981.

Hoggart, Richard. “A Sort of Clowning: 1940-1959.” *A Measured Life: The Times & Places of an Orphaned Intellectual*. Transaction Publishers, 1994.

——. *The Uses of Literacy*. Boston: Beacon Press, 1966.

Inglis, Fred. *Cultural Studies*. Oxford: Blackwell, 1993.

Johnson, Lesley. *The Cultural Critics: From Matthew Arnold to Raymond Williams*. London: Routledge & Kegan Paul, 1979.

Jones, Paul. *Raymond Williams' Sociology of Culture: A Critical Reconstruction*. Palgrave Macmillan, 2004.

Leavis, F. R.. “*Anna Karenina*” and *Other Essays*. London: Chatto & Windus. January, 1967.

——. *Determination*. London: Haskell House Publishers, 1970.

——. *Education & University*. London: Chatto & Wintus, 1943.

——. *For Continuity*. Cambridge: Minority Press, 1933.

——. *The Great Tradition: George Eliot, Henry James, Joseph Conrad*. London: Chatto & Windus, 1948.

——. *The Living Principle “English” as a Discipline of Thought*. London: Chatto & Windus, 1975.

——. *Mass Civilization and Minority Culture*. Cambridge: Minority Press, 1930.

——. *Revaluation: Tradition & Development in English Poetry*. London: Chatto & Wintus, 1936.

——. *Towards the Standards of Criticism*. London: Wishart, 1933.

Leavis, F. R., and Denys Thompson. *Culture and Environment: The Training of Critical Awareness*. London: Chatto & Windus, 1933.

Leavis, Q. D.. *Fiction and the Reading Public*. London: Chatto & Wintus, 1932.

MacKillop, Ian. *F. R. Leavis: A Life of Criticism*. London: The Penguin Press, 1995.

Owen, Sue. “*The Abuses of Literacy* and the Feeling Heart: the Trials of Richard Hoggart.” *The Cambridge Quarterly*, 2005.

Palmer, D. J.. *The Rise of English Studies*.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5.

Richards, I. A.. *The Principles of Literary Criticism*. London: Kegan Paul. Trench. Trubner, 1924.

Selden, Raman. *A Reader's Guide to Contemporary Literary Theory*. Beijing: Foreign Languages Teaching & Research Press, 2004.

Williams, Raymond. "Culture is Ordinary." *The Raymond Williams Reader*. Ed. John Higgins. Blackwell Publishers, 2001.

——. "Culture and Revolution: A Response." *From Culture to Revolution*. Eds. Terry Eagleton & Brian Wicker. London: Sheed & Ward, 1968.

——. *Culture and Society*. London: Chatto & Windus, 1958.

——. *The Long Revolution*. London: Chatto & Windus, 1961.

——. *Marxism and Literature*.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7.

——. *Politics and Letters*. London: Verso, 1981.

雷蒙·威廉斯《文化与社会》,吴松江、张文定译。北京大学出版社,1991年。

[Williams, Raymond. *Culture and Society*. Trans. Wu Songjiang & Zhang Wending. Beijing: Peking University Publishing House, 1991.]

赵国新《新左派的文化政治:雷蒙·威廉斯的文化理论》。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9年。

[Zhao, Guoxin. *The Cultural Politics of New Left: Raymond Williams' Theory of Culture*. Beijing: The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 Research Press, 2009.]

(责任编辑:王嘉军)

(上接第 204 页)

[——. *Critical Theory and Narrative Interpretation. An Anthology of Jameson*. Vol. 2. Ed. and Trans. Wang Fengzhen. Beijing: China Renmin University Press, 2004.]

杰姆逊《后现代主义与文化理论》,唐小兵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

[——. *Postmodernism and Cultural Theory*. Trans. Tang Xiaobing. Beijing: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2005.]

Kellner, Douglas, ed. *Postmodernism, Jameson, Critique*. Washington, D. C.: Maiseonneuve Press, 1989.

赫伯特·马尔库塞《审美之维》,李小兵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

[Marcuse, Herbert. *The Aesthetic Dimension*. Trans. Li Xiaobing. Guilin: Guangxi Normal University Press, 2001.]

弗朗西斯·马尔赫恩《当代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刘象愚等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

[Mulhern, Francis. *Contemporary Marxist Literary Criticism*. Trans. Liu Xiangyu, et al. Beijing: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2002.]

Roberts, Adam. *Fredric Jameson*.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2000.

王逢振“詹姆逊荣获霍尔堡大奖”,《外国文学》6(2008):91-92。

[Wang, Fengzhen. "Fredric Jameson was Awarded the Holberg International Memorial Prize." *Foreign Literature* 6(2008):91-92.]

海登·怀特《形式的内容:叙事话语与历史再现》,董立河译。北京:北京出版社出版集团,2005年。

[White, Hayden. *The Content of the Form: Narrative Discourse and Historical Representation*. Trans. Dong Lihe. Beijing: The Beijing Publishing Group Ltd., 2005.]

杨建刚“文本与意识形态——马克思主义与形式主义对话中的一个关键问题”,《文艺研究》1(2010):17-26。

[Yang, Jian'gang. "Text and Ideology." *Literature and Art Studies* 1(2010):17-26.]

杨建刚 王弦“马克思主义与形式——弗雷德里克·杰姆逊教授访谈录”,《文艺理论研究》2(2012):77-81。

[Yang, Jian'gang, and Wang Xian. "Marxism and Form: An Interview with Fredric Jameson." *Theoretical Studies in Literature and Art* 2(2012):77-81.]

(责任编辑:王嘉军)